

## 太學與五經

太學建於元朔五年是武帝的文治措施，教授內容為儒家的五部經典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《易》和《春秋》，側重於德育。太學的設立創造兩大先河：首先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官學；其二太學考核機制與仕途掛鉤，只要通一經可任官，這種模式對隋唐的科舉制度影響深遠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我們可以從文化史角度切入，第一個部分簡介五經為何，以兩組文物，海昏侯墓以及熹平石經入手，探索「五經」在兩漢的地位。第二部分將探討太學系統的運作，帶出兩漢興衰與太學的關係。

### 五經

許多漢代出土的文獻材料及文物都有「五經」相關的字眼，比如海昏侯墓出土「五經」的竹簡，熹平石經則列明「五經」為何，兩組文物均體現「五經」在兩漢的風行及影響。在具體探索這兩組文物之前，我們更宜先了解「五經」到底是什麼，兩漢的政府及士人對五經推崇的原因。

什麼是「五經」？

「經」即經典，「五經」是五本經典的儒家著作：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和《春秋》，是漢代官方認可的教授材料，用於太學課程。

董仲舒認為時下書籍「諸不在六藝之科<sup>1</sup>、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」，因此提倡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。學習「五經」是開啟仕途的基礎，此舉令儒家地位拔高，成為正統，促進了社會的學習風氣，開啟中國士人的經學傳統。

---

<sup>1</sup> 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

## 五經的作者

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作者不明，或是三代聖王<sup>2</sup>，或是他人，孔子之世以前已有之；至於《春秋》，孟子則認為乃孔子所作<sup>3</sup>。這五本書是春秋時期重要的貴族教材<sup>4</sup>，孔子和其弟子均有修習。

五經與儒家關係密切，普遍認為這五本書均由孔子修編成書，為儒者「內聖外王」必修之術。這五本書涵蓋文學、歷史、禮儀和宇宙觀，既可熏陶情操，又能培養個人鑑古知今和是非判斷的能力。三代聖人的事蹟，為儒者提供了行為規範，尚賢思齊，潛移默化之下，自然而然地就能成就「君子」。

為甚麼是「五經」？

儘管孔子及後學也有提及其它典籍，但只有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和《春秋》五書被尊為「五經」，此無疑與其道德教化功能有關<sup>5</sup>。以下將逐一探討：

### 《詩》<sup>6</sup>

《詩》又稱「詩三百」<sup>7</sup>，是中國最早的歌集。周有採詩制度，樂官採集自民間歌曲，整理加以配樂，讓周天子瞭解下情<sup>8</sup>，惟歌謠是口耳相傳性質，作者身份無從推考，其成書時間不遲於前六世紀<sup>9</sup>。孔子認為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<sup>10</sup>。

---

<sup>2</sup> 夏、商、周

<sup>3</sup>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《春秋》」

<sup>4</sup> 徐復觀，《中國經學史的基礎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82），頁7

<sup>5</sup> Michale Nylan. Introduction to the Five Classics, (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2017), p.12

<sup>6</sup> 對《詩》的解讀到漢代有四家，《魯詩》、《齊詩》、《韓詩》三家統稱為「三家詩」屬於今文派，是官學課程；而毛亨和毛萇另立《毛詩》，是為古文派。現時僅剩下《毛詩》和《韓詩外傳》，其他版本已經散佚

<sup>7</sup> 三百是約數，具體數目有加減

<sup>8</sup> 《詩》中的歌謠原本是能配樂歌唱的，但是樂譜已經散失

<sup>9</sup> Michale Nylan. Introduction to the Five Classics, (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2017), p.21

<sup>10</sup> 《論語·季氏》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

《詩》的題材涉及農耕、婚嫁等習俗<sup>11</sup>，又有記錄貴族飲宴的情況<sup>12</sup>及周皇室的宗廟祭祀<sup>13</sup>。

孔子言對《詩》曾有此評註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『思無邪』<sup>14</sup>」，《詩》不但是教育、諷刺一體<sup>15</sup>的作品，聆聽音樂有安撫心靈、陶冶情操之效，可以促進修養，所以《詩》之教備受儒家推崇。

### 《書》<sup>16</sup>

子曰：「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」<sup>17</sup>，孔子尚古，尤其推崇周文，欲效法周公，所以有此感慨。那麼孔子是從何得知周的事蹟？那便是從《書》中習得。

《書》又稱《書經》或《尚書》，成書時間應與《詩》相約，作者不明。《書》為記言體，篇目以時代劃分，記述時期涵蓋夏、商、周三代，上起堯、舜，下至春秋時期的秦穆公，其內容主要記錄君主事蹟、君臣之間的對話，有勸戒之辭，也有謀議、戰爭的動員和誓師。

---

<sup>11</sup> 稱為風或國風，作者為平民

<sup>12</sup> 是為小雅及大雅，作者是貴族

<sup>13</sup> 頌，較為莊嚴的樂曲，述祖先之德而求庇佑

<sup>14</sup> 《論語·為政》

<sup>15</sup> 《毛詩·序》：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」

<sup>16</sup> 《書》和《詩》、《禮》和《春秋》均不能倖免於秦火，不過當時有一知識分子——伏生將《尚書》藏於壁中，保留了下來，是為今文經。不幸的是遭受戰亂和社會動盪，《書》在漢初僅剩下二十餘篇，伏生在齊、魯之間教學，而後來成為尚書博士的歐陽生和張生都是師承伏生見班固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秦燔書禁學，濟南伏生獨壁藏之。漢興亡失，求得二十九篇，以教齊魯之間」

<sup>17</sup> 《論語·述而》

《尚書》在漢發展成三家：「歐陽氏學<sup>18</sup>」、「大夏侯氏學<sup>19</sup>」和「小夏侯氏學<sup>20</sup>」<sup>21</sup>。武帝年間，三家均為博士，授今文版《尚書》。惟三書現已失傳，只能從熹平石經推測歐陽氏本的面貌。

學習《書》有助認識上古時期的歷史和政治思想，從上古賢王的身上學習君臣相處。將之列為「五經」之一，意味昭然若揭。

### 《禮》

「禮」包含一切儀式，也泛指莊重的行為，所以其不但是文化的載體，也有約束的功能<sup>22</sup>。子曰：「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<sup>23</sup>」，禮對個人修身，甚或國家統治均有巨大影響。

《禮》<sup>24</sup>分為六大章節<sup>25</sup>，每一章均應不同官職所作，記述其職能及規範、周代的行政機構及其管理模式，折射出一種理想的政治模式。西漢時本無其書，劉德得《周官》古文經<sup>26</sup>後上貢給朝廷，始有此書，又因荀悅與劉歆更名才被稱為《周禮》。王莽志於重建周代政府管理架構，《大戴禮記》和《小戴禮記》<sup>27</sup>均被納入太學課程內，教授諸生。

《禮》原本是周代的官制，但發展至漢《禮記》，官位的職能部分許多已被刪減，使其道德意味更為濃厚。剩下的諸如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等章目更是直指進學成德、為人處世的辦法。

---

<sup>18</sup> 歐陽高

<sup>19</sup> 張生弟子夏侯勝

<sup>20</sup> 夏侯建

<sup>21</sup> 班固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訖孝宣世，有歐陽、大小夏侯氏，立於學官」

<sup>22</sup> 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子曰：『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』」

<sup>23</sup> 《論語·憲問》

<sup>24</sup> 又稱「周官」、「周官禮」和「周官經」

<sup>25</sup> 《天官冢宰》、《地官司徒》、《春官宗伯》、《夏官司馬》、《秋官司寇》、《冬官攷工記》

<sup>26</sup> 班固，《漢書·景十三王傳》：「恭王初好治宮室，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，聞鐘磬琴瑟之聲，遂不敢復壞，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」

<sup>27</sup> 另加《月令》、《明堂位》和《樂記》三篇

## 《易》

「易」即變化。孔子曾感嘆若生命再多數年，在五十歲讀《易》，此生就可以不犯大錯了<sup>28</sup>，這足見孔子對《易》的推崇。古有「三易」的說法<sup>29</sup>，但《易》的成書時間不明，作者也無法查考。前兩本已失傳，只剩下《周易》<sup>30</sup>。因為《易》是一本占卜書，所以免於秦火，是「五經」中保存得最良好的作品。

《周易》內容玄妙無窮，涉及天文曆法，接通於「道」<sup>31</sup>，有趨吉避兇之效。當中有六十四卦，每卦的經文分為符號和文字兩部分<sup>32</sup>。因為《易經》晦澀難懂，所以後人作傳解釋。《易傳》的內容分七個部分，共十篇，故稱「十翼」<sup>33</sup>。

《周易》是卜辭<sup>34</sup>，體現占卜的平民化<sup>35</sup>，透過隨意投砸就能得到一個隨機爻象，翻查《易》便得出答案。先秦諸子都認為自己的學派最合於「道」，這個道不但是人世的「道」，比如為政道、人道，更是接通一種冥冥中的神奇力量——世界的規律。未必所有事情都有答案，想不通時，知識分子就會訴諸形上答案，這恰好能在《易》中找到。

雖然漢初的思想形態在黃老道家與儒家間拉鋸，但《易》是兩家都會修習的學問。將之列為「五經」，是因為其具神奇的指引性，對知識分子有巨大的吸引力。

---

<sup>28</sup> 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」

<sup>29</sup> 《周禮·春官大卜》：「掌三易之法，一曰連山，二曰歸藏，三曰周易」。三易即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和《周易》

<sup>30</sup> 有說《易》乃周文王所作

<sup>31</sup> 世界的規律

<sup>32</sup> 黎子耀，《周易導讀》，（北京：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9指出周人以天文曆法中的象數組織卦爻，有陽爻(—)和陰爻(-- )兩種。三爻構成一卦，有八種形式，是為八卦（乾、坤、坎、離、震、巽、艮、兌）；八經卦與八緯卦相重，則得六十四卦

<sup>33</sup> 《彖傳》上、下，《象傳》上、下，《文言》，《繫辭》上、下，《說卦》，《序卦》和《雜卦》

<sup>34</sup> 占卜的記錄

<sup>35</sup> 材料能在生活中找到，諸如著草、龜甲和銅錢

## 《春秋》<sup>36</sup>

《春秋》是中國首部編年體史書，記錄從魯隱公元年<sup>37</sup>到魯哀公十四年<sup>38</sup>間魯國十二位君主的歷史，反映魯國的內政、外交、戰事等大事。《春秋》所錄時期是東周前半部分，後來也因而命名為「春秋」。該書或由魯國史官集體編寫，或為孔子作品<sup>39</sup>。漢武帝在「五經」中尤其偏愛《春秋》<sup>40</sup>，令《公羊》成為西漢的官學；宣帝則偏愛《穀梁》，其與《公羊傳》出現分庭抗衡之勢。

《春秋》所記時間清晰，每篇都是按照年份、季節、月、日排序，先記時間再以短句敘事。這種書寫模式被稱為「春秋筆法」，其不直接表達態度，反而在選材、用字等方面委婉表示。《春秋》是歷史書，也蘊藏作者的價值判斷，所以具道德意味，儒者閱此可以明是非，知善惡，故不作與身份衝突之事。

小結：

「五經」是把五本儒家典籍列為經典，在太學教授經書的目是培養生員的全人發展：《詩》溫柔敦厚，有熏陶情操之效；《書》尚友古人學習為政之道；《禮》釐明職責，培養德位相稱的人才；《易》內容奧妙，通於「道」；《春秋》明是非，重思考。「五經」系統發展至後代已經不限於五本，到了明代甚至有《十三經》<sup>41</sup>。「五經」的設立無疑提高儒家的地位，令其在諸多學派脫穎而出，「經學」在漢以後更成為中國文學的正統。

---

<sup>36</sup> 《春秋》所記之事言簡意賅，所以後有五家作傳解，分別為《左氏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、《鄒氏傳》和《夾氏傳》。《鄒氏傳》和《夾氏傳》現已缺失，而《左氏傳》、《公羊傳》和《穀梁傳》被合稱為「春秋三傳」。《左氏傳》是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，所以又稱為《左傳》，是古文經，以敘事為主；《公羊傳》和《穀梁傳》是今文經，以解經為主。有說《公羊傳》作者為戰國時期的公羊高，而《穀梁傳》作者傳說為春秋時的穀梁赤。兩傳共同點在於以問答形式解讀《春秋》，然後判斷當中的微言大義。

<sup>37</sup> 公元前 722 年

<sup>38</sup> 公元前 481 年

<sup>39</sup> 見註釋 5

<sup>40</sup> 班固，《漢書·儒林傳》：「漢武帝時尊公羊家，詔太子受公羊《春秋》，由是公羊大興」

<sup>41</sup> 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爾雅》和《孟子》

## 文物與五經

### (一) 海昏侯墓

海昏侯墓位於江西省南昌市<sup>42</sup>，是漢廢帝劉賀的陵墓。劉賀是漢武帝的孫子<sup>43</sup>，由於宣帝無後，所以霍光改立昌邑王劉賀為漢帝，但其在位僅僅 27 日被廢<sup>44</sup>，後被改封為海昏侯<sup>45</sup>。

該墓自 2011 年開始發掘，為近年中國考古最重要的發現之一。墓中出土一萬件文物，當中有五千多個簡牘，許多是西漢時期的文獻，內含有《詩》、《禮》及《春秋》為五經其三，又有不同版本及註釋<sup>46</sup>，又有一面鏡屏。該屏特別之處在於背後有儒家師徒的圖畫，這是現有最早的孔子畫像，故學者暫稱為「孔子衣鏡<sup>47</sup>」。

我們能從海昏侯墓發現什麼？

直到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技術，紙才開始廣泛成為文字的載體。由於海昏侯劉賀是西漢人，在蔡倫之前，其墓穴發現的簡牘便是當時主要的書寫面。

竹簡厚重，不便攜帶，抄錄麻煩需時，平民不可能擁有五千多卷。劉賀墓出土的竹簡數量龐大，一方面證明墓主人身份高貴、富裕且喜愛閱讀；另一方面，「五經」有三本被書於竹簡，反映「五經」的風行程度，即使是曾為漢帝的劉賀也將此收於墓中，

---

<sup>42</sup> 位於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區大塘坪鄉觀西村墾墩山

<sup>43</sup> 《漢書·諸侯王表》：「昌邑哀王髡武帝子。天漢四年六月乙丑立，十一年薨。始元元年，王賀嗣，十二年，徵為昭帝後，立二十七日，以行淫亂，廢歸故國，予邑三千戶」

<sup>44</sup> 《漢書·宣帝紀》：「元平元年四月，昭帝崩，毋嗣。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。六月丙寅，王受皇帝璽綬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癸巳，光奏王賀淫亂，請廢。語在賀及光傳」及《漢書·諸侯王表》：「昌邑哀王髡武帝子。天漢四年六月乙丑立，十一年薨。始元元年，王賀嗣，十二年，徵為昭帝後，立二十七日，以行淫亂，廢歸故國，予邑三千戶」

<sup>45</sup> 《漢書·宣帝紀》：「三月，詔曰：「蓋聞象有罪，舜封之。骨肉之親絜而不殊。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」

<sup>46</sup> 楊軍、徐長青，〈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〉，考古，2016 年 07 期

<sup>47</sup> 楊軍、徐長青，〈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〉，考古，2016 年 07 期

足見「五經」的重要性。

墓中發現的「孔子衣鏡」呼應上文的說法。孔子是儒家的開創者，生前因為政治失意所以辦學廣收門徒。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，諸侯均行霸道，主張王道的儒家的學說並沒有凌駕的地位。然而，在漢廷實行獨尊儒術的政策，大力提倡以五經授課，孔子乃至儒家的地位就有一大躍升，海昏侯墓中「孔子衣鏡」的存在就是有力的證據。

## （二）熹平石刻

什麼是熹平石經

熹平石經是作於東漢熹平四年<sup>48</sup>的刻石，共四十六碑，高十尺，寬四尺、共二十餘萬字，立於東漢首都洛陽太學門外<sup>49</sup>。遺憾的是，刻石多受損壞，現存百餘塊殘石存於中國各大博物館。

自武帝後「五經」成為官學，然而秦火與戰爭令五部經典散佚，時人為依靠記憶背誦出來，是為今文經。經書的原版（古文經）相繼出現，且在社會流傳。學者爭辯何者為正確，所以有古文經和今文經之爭。漢廷擁立今文經，以此為太學的教材，設五經博士教授。

至東漢時，「五經」已廣泛流傳，但是經書反復抄寫，文字多有錯漏。所以在靈帝時期，朝廷便校訂經文，將之刻於石碑，就是產生了熹平石經。是故石經記載了「五經」名稱及東漢時期官方認可的版本。除了「五經」，石經亦包括《公羊》、《儀禮》等與五經相關的典籍。

---

<sup>48</sup> 公元 175 年

<sup>49</sup> 範曄，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熹平四年，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，刊於石碑，為古文、篆、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，樹之學門，使天下咸取則焉」



小結：

無論是西漢海昏侯墓還是東漢熹平石經都有「五經」的記載，可見「五經」具官方認可，是極為重要的官學典籍，在兩漢有超然的地位。

## 太學

### （一）太學成立背景

武帝建太學絕非一時興起，當中有許多社會政治考慮。為了能長治久安，漢初文人積極反思秦速亡之由，得出結論：秦焚書坑儒，不重學風，暴力統治，社會缺少道德教育穩定人心<sup>50</sup>。從漢開國至景帝年間，君主貫徹輕賦稅、重農業，與民休息的政策，國家累積財富<sup>51</sup>。漢景帝肅清七王之亂，武帝更憑藉中央集權完成國家的大一統。興辦學校需要眾多資源，父輩的努力耕耘，無不為武帝的「文治」奠下基礎。

武帝即位之初就有許多大臣上疏復興儒學<sup>52</sup>，不過竇太后阻撓，未能成事。直到元朔五年，思及文化與道德教育的貧乏，不利統治與國家發展，亦為了避免重蹈秦窮兵黷武的覆轍，武帝便採納董仲舒與公孫弘等人的提議<sup>53</sup>於長安建設中國史上首個官辦教育機構——太學。除了《詩》和《春秋》<sup>54</sup>被選為課程，更另設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，由「五經博士」教授儒家經學，為政府培養人才。

<sup>50</sup> 賈誼，《過秦論》：「及至始皇，奮六世之餘烈，振長策而馭宇內，吞二周而亡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執捶拊以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……於是廢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；墮名城，殺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陽……」

<sup>51</sup> 司馬遷，《史記·平準書》：「至今上即位數歲，漢興七十餘年之間，國家無事，非遇水旱之災，民則人給家足，都鄙廩庾皆滿，而府庫餘貨財。京師之錢累巨萬，貫朽而不可校」

<sup>52</sup> 班固，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「建元元年冬十月，詔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。丞相綰奏：『所舉賢良，或治申、商、韓非、蘇秦、張儀之言，亂國政，請皆罷』奏可」

<sup>53</sup> 公元前 124 年

<sup>54</sup> 《詩》和《春秋》在景帝時已置博士。章權才，《兩漢經學史》，（台北：萬卷樓，1995），頁 86

## （二）太學的發展怎樣反映兩漢歷史

太學建於元朔五年，漢武帝在長安設立校舍，收生員五十人。西漢後期至東漢前期太學發展迅速，由於漢廷重視辦學，因此太學收生規模不斷擴張。從武帝時期的五十人，發展至昭帝時期的百人，元帝時期的千人；到成帝末年，太學收生已擴展至三千人<sup>55</sup>。由於生員數目龐大，王莽在平帝時期開始擴建校舍，令太學規模足以容納萬人，史稱「築舍萬區」<sup>56</sup>。

時至東漢，漢室遷都洛陽，建武五年，光武帝劉秀在洛陽新立太學。明帝時期，皇室、諸侯及大臣之後代均修經學<sup>57</sup>，且另立「四姓小侯學」<sup>58</sup>，吸引外族慕名而來<sup>59</sup>。

東漢和帝以後，外戚、宦官擅權，政治不利因素導致太學衰敗。安帝時期學風敗壞<sup>60</sup>，順帝中興，力挽狂瀾擴大校舍<sup>61</sup>，廣招生員，令學生數目激增至三萬人<sup>62</sup>，但是時太學已無儒者之風<sup>63</sup>。桓靈時期，敢言的太學生因「清議」公開抨擊宦官專政，而得罪宦官集團，引下兩次黨錮之禍，大批學生被終身囚禁或誅殺<sup>64</sup>。靈帝受唆擺設立「鴻門學都」制衡太學，令太學地位下降。漢末的黃巾之亂和州牧割據，使社會不穩、政治黑暗，嚴重影響太學運作，最終更令教學終止。

<sup>55</sup> 班固，《漢書·儒林傳》：「昭帝時舉賢良文學，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，宣帝末增倍之。元帝好儒，能通一經者皆復。數年，以用度不足，更為設員千人，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。成帝末，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，今天子太學弟子少，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」

<sup>56</sup> 班固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：「是歲，莽奏起明堂、辟雍、靈臺，為學者築舍萬區，作市、常滿倉，制度甚盛」

<sup>57</sup> 袁弘，《後漢紀·孝和皇帝紀下卷第十四》：「永平中，崇尚儒學，自皇太子，諸王侯及功臣子弟，莫不受經」

<sup>58</sup> 袁弘：《後漢紀·孝和皇帝紀下卷第十四》：「外戚樊氏、郭氏、陰氏、馬氏諸子弟立學，號曰四姓小侯」

<sup>59</sup> 範曄，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其後復為功臣子孫、四姓末屬別立校舍，搜選高能以受其業，自期門羽林之士，悉令通孝經章句，匈奴亦遣子入學。濟濟乎，洋洋乎，盛於永平矣」

<sup>60</sup> 範曄，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自安帝覽政，薄於藝文，博士倚席不講，朋徒相視怠散，學舍積敝，鞠為園蔬，牧兒蕘豎，至於薪刈其下」

<sup>61</sup> 範曄，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，千八百五十室」

<sup>62</sup> 範曄，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本初元年，梁太后詔曰：「大將軍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就學，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，以此為常。自是遊學增盛，至三萬餘生」

<sup>63</sup> 範曄，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然章句漸疏，而多以浮華相尚，儒者之風蓋衰矣」

<sup>64</sup> 範曄，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黨人既誅，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，後遂至忿爭」

### （三）太學的教學模式與授課內容

「博士」是教導「五經」的專職學官，所以又名「五經博士」，他們是經學的專家，在太學擔任老師的職責。太學學生，在西漢稱為「弟子」，而東漢則稱為「諸生」。武帝時太學只有五十個學額，篩選條件是「年十八以上，儀狀端莊」的官宦子弟<sup>65</sup>，而地方地主子弟也可作為旁聽生，是為「受業子弟」。前者有官祿、免役，而後者則要費用自理。<sup>66</sup>

太學的授課形式和現代大學相似，學生以自修為主，大班教導「五經」的正課。光武帝設十四名博士分別教授今文經<sup>67</sup>《施氏易》、《孟氏易》、《京氏易》、《梁丘易》、《歐陽書》、《大夏侯書》、《小夏侯書》、《魯詩》、《齊詩》、《韓詩》、《大戴禮》、《小戴禮》、《嚴氏春秋》和《顏氏春秋》<sup>68</sup>。正課以外時間，學生可以按個人興趣學習，他們既可以請教校外名師、高足弟子<sup>69</sup>，也可以和同儕互相交流<sup>70</sup>。太學不設畢業年限，但學生必須通過考試才可以授予官職，所得的成績和所分派官位相等。

#### 小結

太學既是學府，也是一種仕途機制，學子進入太學的目的是以謀求官職，以「五經」為課程旨在培養德位相稱的預備官員。

太學的發展與漢的盛衰互為因果。一方面，漢廷重視教育令太學發展蓬勃，但社會因素也會影響太學運作。另一方面，太學的設立推動了社會學習風氣，學子修讀經典可陶冶性情，而這個與仕途緊扣的制度也培養不少政治人才。學生居住在校舍與同儕協作，促進彼此交流，一同進學修德，無疑是兼具個人與群性發展。然而，這個制度並

<sup>65</sup> 晉文，〈漢代太學淺說〉，山東師範大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，2001年第6期

<sup>66</sup> 同上註

<sup>67</sup> 與古文經相對。古文經在秦始皇「焚書坑儒」及咸陽被攻陷之後所起的「秦火」大量缺失。因此依賴時人口耳相傳，重新默寫出來，這個版本就是今文經。

<sup>68</sup> 範曄，〈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〉

<sup>69</sup> 高年級學生

<sup>70</sup> 晉文，〈漢代太學淺說〉，山東師範大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，2001年第6期

未完善，只教授儒家學說難免予人：統治者將個人思想移植於儒家經典，並將聖人之言合理化統治措施的猜想<sup>71</sup>。不僅如此，博士數目遠遠追不上學生人數，只能由弟子高足助教，難免影響教學質量。

---

<sup>71</sup> 林曉希，〈近三十年來漢代經學研究述評〉，雲南社會科學，2014年第5期，頁27-31引朱日耀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結構及其特點》